



国学经典书系（**第一辑**）初级版

总主编 雷恩海

《史记》

品读

何安平 著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
LANZHOU UNIVERSITY PRESS



国学经典书系（第一辑）初级版

总 主 编	雷恩海						
副 主 编	陈晓强	曾贤兆					
编 委	蒋 凡	吴兆路	周绚隆	方 铭	马永强		
	雷恩海	陈文江	崔 明	陈晓强	曾贤兆		

《

史

记

》

品读

何安平 著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
LANZHOU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《史记》品读 / 何安平著. — 兰州 : 兰州大学出版社, 2016. 11
(国学经典书系 / 雷恩海总主编)
ISBN 978-7-311-05040-5

I. ①史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古代史—纪
传体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04.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8297号

责任编辑 锁晓梅
封面设计 郇海

书 名	《史记》品读
作 者	何安平 著
出版发行	兰州大学出版社 (地址: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)
电 话	0931-8912613(总编办公室) 0931-8617156(营销中心) 0931-8914298(读者服务部)
网 址	http://press.lzu.edu.cn
电子信箱	press@lzu.edu.cn
印 刷	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mm×1020 mm 1/16
印 张	17.25
字 数	239千
版 次	2017年12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311-05040-5
定 价	35.00元

(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、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)



序



雷恩海

—

“国学”是一个历史名词,出现于清末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,西方在完成其政治变革与工业革命之后,开始有计划地东进,东方世界成为西方开发的巨大市场,并且带着强烈的殖民性。欧风美雨东渐,以坚船利炮裹挟着强势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思潮,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五次侵略战争,而且曾是朝贡体系内的日本,也以强势侵袭。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,中国学人惊惧、疑虑、拒斥、反思,有亡国灭种之忧患,进而提出要对中国的学术进行全面的研究。最有代表性的是张之洞,在《劝学篇》中提出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强调在保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,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与中国政治、文化不冲突的外来成分。实际上,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,西方先于东方实行近代化,当东西方遭遇之时,必然会带来冲突。这一现象,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“中西之交,古今之异”。“国学”的概念,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应运而生。国学,即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。时任清华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教授认为,“所谓国学者,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”(《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》)。蔡尚思说:“国是一国,学是学术,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。其在中国,就叫做中国的学术。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,那就无所不包了;既然无所不包,也就无所偏畸了。”并且说“中国的固有文化,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”(《中国学术大纲》)。应对西方文化之强势进入而产生的“国学”概念,既要保全中国故有文



化学术,又要汲取西方学术文化之精髓,承载着统合中西文化的使命。1902年,黄遵宪《致梁启超书》赞同梁氏“养成国民,当以保国粹为主义,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”,并且说“今且大开门户,容纳新学。俟新学盛行,以中国固有之学,互相比较,互相竞争,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,真道理乃益明,届时而发挥之。彼新学者或弃或取,或招或距,或调和,或并行,固在我不在人也”,主张融会中西学术,开启国学之新局面。1911年,国学大师王国维为《国学丛刊》作序,明确指出:“今之言学者,有新旧之争,有中西之争,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。余正告天下曰:学无新旧也,无中西也,无有用、无用也。何以言学无中西也?世界学问,不出科学、史学、文学。故中国之学,西国类皆有之,西国之学,我国亦类皆有之,所异者,广狭疏密耳……余谓中西二学,盛则俱盛,衰则俱衰,风气既开,互相推助。且居今日之世,讲今日之学,未有西学不兴,而中学能兴者;亦未有中学不兴,而西学能兴者。”因而,“国学”就是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,对中国学术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总结,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,也是传统学术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自身位置的一种努力。当时尚有国粹、国故之称。国粹,似乎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;而国故则指本国文献(过去的文献),但国故只能代表研究的对象,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。相比较而言,还是“国学”一词,比较全面公允一些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兴起“国学”热,积极响应者有之,批评者有之。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,“国学”持续受到许多人的欢迎,人们对国学的认识也日趋理性。国学热之兴起,乃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恢复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,虽然我们的国力增强了,但到今天为止,我们仍然处于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,无论科技,还是文化等,西方仍然处于领先地位,世界仍然处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格局之中。那么,如何在科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成为世界强国,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价值、精神文明体系,确立文化自信,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。显然,重新审视传统,阅读传统,就成为一种必然。国学热,乃民间自发,而最后由在上者所认识而进一步倡导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,“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



的根本,如果丢掉了,就割断了精神命脉”,极为精辟地指出了国学的根本内涵和意义。

研究国学,并非抒发思古之幽情,更不是排斥来自西方的新思想。国学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积淀,承载着传统文化,而传统是演进的而非僵化的,是历史与现在之间的价值纽带。国学不但是历史的积淀,而且也是面对现在而指向未来的。因此,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国学是不应该被忽略甚至于忘记的。忽略甚或忘记了传统,也就失去了当下的根基,无法谋划现实的生存,因而也无法明确未来的走向。譬如,一个人今天早晨起来后,他失忆了,忘记了昨天及以前的事情,那么,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我,不知道今天该干什么,无法安顿自己,即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定位。他忘记了自己的过去,站在大街上,茫茫然不知所从,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,是去市政府上班,还是进入学校教书,是去清扫马路,还是到工厂做工。不知道今天做什么,就无法安顿心灵,也就不知道自己的生存状态,那么他将如何生存呢?忘记过去,就是割裂其历史;不知道今天,那么,就无法知道明天。事实上,忘记了昨天,就意味着今天、明天都处于一个无所举措的状态。一个民族也是如此,忘记其传统,割断历史,就没有现在的发展和未来走向;而继承、发扬其优秀传统,以开阔的视野,吸收新的文化素养,吐故纳新,继往开来,它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
国学,从广泛意义上来说,就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。学习国学,即在于传承文化,以一种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,继往开来。“所谓文化,就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,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、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,一种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。”那种以学术为生命的不懈追求,正是对优秀文化的传承,是华夏民族的凝聚力所在。文化割弃了传统,是贫瘠的文化,最终也就导致其衰败。没有文化的民族,即没有其灵魂。陈寅恪先生在《冯友兰〈中国哲学史〉下册审查报告》中提出民族文化本位的问题:“是以佛教学说,能于吾国思想史上,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,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。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,若玄奘唯识之学,虽震动一时之人心,而卒归于消沉歇绝……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,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

东欧之思想,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,在吾国思想史上,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,且亦终归于歇绝者。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,有所创获者,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,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,乃道教之真精神,新儒家之旧途径,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。”

文化是民族的根性所在,马克思说:“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,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,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,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。”传承文化,发扬优秀传统文化,以开阔的视野、恢弘的气度,与世界上诸多文化交流,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延续,继往开来,开拓创造华夏文化的新境界。冯友兰先生以哲学家的睿智,提出“阐旧邦以辅新命,极高明而道中庸”,乃是对华夏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的高度概括,也是对华夏文化吸收外来文化,融入世界潮流的期望。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——希望华夏民族能够奋发图强,成为一个拥有优秀而悠远的文化传统、具有开阔视野和创新活力的现代化国家。没有继承,就没有创新,关键乃守正而出新。

二

一般来说,国学大致被理解为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,其内容应包括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学,融合儒释道诸家,而又以儒学为主体。事实上,国学乃一种载体,传承的精神品性、知识技能,可以说是经过时间淘汰而流传下来的精华。国学需要借鉴西学的研究方法,汲取其学术素养,全面整理、研究,融会贯通,传扬其优秀文化品质。一个人的成长,要有自身资源、家庭资源、社会资源,还要有历史资源。而这历史资源就是国学所承载的主要内容。

读书不仅仅是获取信息,储备知识。这种记诵之学,在严格意义上来讲,不是学习的根本目的。就是说,读书乃为求知,在于培养具有思想性的人才,借助作者的思维过程、思维方式,来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,提高自身的水平与





能力。知识之获得,不可能凭空而来,必须借助于某种媒介,通过一种介质的训练、培养,而使我们获得知识,化为能力,练人才性,提升思维能力。训练思维,培养能力,正是读书学习的关键。学习前代的文化典籍,正是训练思维、获得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。爬罗剔抉,提要钩玄,乃逻辑思维的归纳与演绎之训练。读一本书,如果仅仅停留在了解一个故事、事件的层面,显然是浅层次的;而有意识地、主动地借助于他人的思维方式、思维过程,训练自己的思维,培养自己观察问题、处理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,无疑是深入的读解,达到了读书求知之目的。而阅读理论性的书籍,其精密的逻辑思维、推理论证、辨疑析难的能力,显然对训练思维、培养能力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说:“积学以储宝,酌理以富才,研阅以穷照,驯致以绎辞。”源远流长、充实丰富、瑰丽多彩的国学经典,积淀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品。阅读、研究,正可以训练思维,培养能力。

然而,长期以来,我们忽略了对国学的阅读与传承,甚至于忽略了阅读本身。所谓“国学热”“文化热”,事实上并没有“热”起来,往往呈现为喧嚣的“争鸣”,甚至是浮躁的状态,尚未切实地进入阅读本身。在热闹、喧嚣的“文化热”氛围之中,如何自我定位,如何寻求阅读的对象、内容,需要做出“冷静”的判断。说到底,阅读是一种个人行为,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、知识储备,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,以进德修业,提高自身文化品性和判断问题、分析问题的能力。这就需要不盲从,不跟风,有自己的定见,根据自己的需要,或者研究的需要,有针对性地阅读,这样才会有比较快的提高。

所谓阅读,就是指对一部书,或者一篇文章,从头到尾地读下来。清人冯班在《钝吟杂录》中说:“多读书则胸次自高,出语皆与古人相应,一也;博识多知,文章有根据,二也;所见既多,自知得失,下笔知取舍,三也。”这样读书的好处,首先是专注。思想集中才有兴趣。无论任何科目,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,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,兴趣即盎然而生。第二个好处是系统深入地理解。因为能够专注地读完一篇文章、一部书,对作者的思想与意图以及文笔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说,他



读书是拿到一本书,从头读到尾,即使这部书不太好,也不中辍。因为从头读到尾,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,好在何处,不好又在何处,斟酌损益,当有所得。第三个好处,思维空间很大,触类旁通。一篇文章或一部书,无论是记叙类的,或者是理论类的,都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,会围绕着事件或问题,全面地展开,这样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思考的场域,从而调动自己的思维,开拓思维能力,进而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和理解水平。第四个好处,就是训练思维,提高能力(阅读能力,理解能力,更是判断问题、分析问题、处理问题的能力)。就是说,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。海量信息有时候是无用的信息,反而淹没了读者,导致他们不会判断、分析,成为散乱信息的收集者,成为“两脚书橱”。第五个好处,就是加强知识的系统性。任何知识都有其系统性。清代著名作家、画家郑板桥用盖房子的道理谈画竹子的体会:“昔萧相国何造未央宫,先立东阙、北阙、前殿、武库、太仓,然后以别殿、内殿、寝殿、宫室、左右廊庑、东西永巷经纬之,便尔千门万户。总是先立其大,则其小者易易耳。”先立其大,即要有大判断,对研究对象要“目有全牛”,而不是盲人摸象。分清何者为主纲,何者为末节。主纲确立,而后细节才能发挥作用,有益于支撑和加强主纲,两者相得益彰,发挥更大的效益。知识是系统的,读者把握住一端,由此深入下去,既是深度的钻研,也是广度的拓展。这样读书,就能够触类旁通,举一反三,摆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狭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铨裁》说:“首尾圆合,条贯统序。若术不素定,而委心逐辞,异端丛至,骈赘必多。”知识系统和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,对问题的认识,也就能够识其大体,有大判断。

三

作为一个中国人,应该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有所了解,既要知其精粹思想,也要了解其陈腐的观念;要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,还应有虚心诚实的心态,以了解之同情对文化传统继承与发扬。文化的发展,有累积性,也有否定性,因而才能创造性地继承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革故鼎新,既要延续我们的文化,



又要创造新的文化传统。

与现代学科分类不太相同,国学包括义理之学、考据之学、词章之学、经世之学,涵盖传统四部分类的经、史、子、集,内容丰富,贡献巨大;既有知识性的体系,又颇重视经世之学,强调“载道”,传达一种精神品性。事实上,学术研究、文化传扬,实乃“网罗天下放佚旧闻,稽其成败兴废之理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(司马迁)。

因此,我们编撰这套“国学经典书系”,既重视知识的系统性,也强调“载道”及人格之养成。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,什么是中国文化。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基本的、核心的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。国学经典对人的道德品性形成,有其重要意义。格物致知,正心诚意,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由内而外,由个体而推广及于整体、国家以至于天下;反过来,又由天下情怀而对个体的道德品性做观照,提高个体的境界。而且,国学经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,乐群、敬业、爱国、独立思考,既注意上下有序,又重视人的自觉与平等。乐和同,礼别异。在追求个性自由、重视个人之同时,也不忽略集体性,将个体与家国利益相统一;既要有灵活性,能够跨界创造,又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,坚守岗位。国学经典有助于培养读者的思维能力、思维方式,提高基本文化素养。从狭义来说,知识是技能性的,而文化则是一种能力,一种判断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,也是一种生存的境界。二十世纪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《新原人》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分为四种:自然境界,功利境界,道德境界,天地境界。天地境界,不是直接的经世致用,而是融入了一种可以包容天地的胸襟,这是道德、人格的升华;升华到与万物为一,超越其他三个境界,而有了物我一体、万物皆备于我的相通,这时精神最为自由,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。这种对学术的痴迷,纯粹出于兴趣的探索精神,很有一些中国古人所说的“谋道不谋身”的意思,对形而上的“道”的追求,自然会获得“谋身”的结果。而原创性的科学发明和理论创造,所依赖的正是这种“谋道”的精神。国学经典是最佳的媒介,读书明理,获得能力,而非仅仅是“两脚书橱”的知识储备。世界文明古国,只有中国是自古



延续至今。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,传承创新,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使命。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、坚韧不拔的毅力、文化的包容品性,都是我们走向未来、开创未来的思想文化资源。

“国学经典书系”以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法编选篇目,针对不同的读者群,分为初级版和普及版,由原文、题解、注释、品读、扩展阅读等模块构成。原文,选择佳好的版本,如精校本、注释本,选编原文,力求保持原典的本来面目,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、佳好的文本,使读者能够对原典有一个全面、整体的把握。题解,乃是对所选的篇章、片段,做出一些必要的交代和说明,以便明了上下文之间的内容及关系,有助于读解文本。注释,力求简洁,一般只注字、词,不注句子,方便阅读和理解。品读,乃是对所选原文的品评、欣赏、理解,着重从故事性、趣味性上,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,讲述其丰富生动的内涵,“理”寓于“事”中,“事”因“理”而深刻、生动。品读也尽可能地揭示思想的力量、文章的内涵以及思维的逻辑,期望有助于阅读能力的提升。扩展阅读,则是选择与原文相关(相似或相反、不同视阈的记载等)的内容,或者见出所选的文字、故事在后世的影响或衍生,启发联想,拓展知识,训练思维。而品读和扩展阅读,事实上是将阅读与思考结合起来,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。弗朗西斯·培根说:“读书使人成熟,讨论使人丰富,写作使人严谨。”读、思、写三位一体,写是在多读深思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的表现。写出来,才是对思维的进一步完善;读、思、写相结合,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阅读水平,训练思维,进而使人可能具有天地境界。

这套书系的编撰,力求内容丰富、生动,富有启发性,引起读者对国学原典阅读的兴趣,丰富其国学素养,培养读书的境界。近代大学者王闿运说:张之洞是看书人,曾国藩是读书人,“所谓读书人,能通经致用;看书人,则书是书,人是人,了不相涉,即所谓记问之学、博而寡要者也”(刘成禺《世载堂杂忆》)。就是说,读书人要能掌握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之中,知行合一。期望我们都做个有思想、有创造力的“读书人”。

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。读书学习,就在于确立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

基。古人云：“立身以力学为先，力学以读书为本。”所谓“立身”，实乃关乎其人之思想境界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有思想的生命才是完整的。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，则有什么样的“立身”原则、行为方式，也因而确定了其人日后的成就。思想清明、品格伟大之人，介然有守而不因循守旧，也不随波逐流。读书人知行合一，多读书，可以怡情悦性、涵养性情，可以洞明事理、培育思想，从此打开一个智慧的世界。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，观古今于须臾，抚四海于一瞬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2017年11月10日

春融堂

序



009



前言



司马迁，字子长，西汉夏阳（今陕西韩城市南）人，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（前145）。他十岁之前在故乡一边耕田放牧，一边学习。十岁时，他已经能诵读古文。所谓古文，是和汉代隶书（今文）不同的先秦时代的古文字，这为他后来搜集、考订古文史料打下了基础。十七八岁以前，他跟随董仲舒学习过《春秋》，二十岁左右又随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学习古文《尚书》。

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，读书暂告一段落后，二十岁的司马迁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。到长沙，他看过屈原所沉之江，行船于沅江、湘江上，观览九嶷山，又南上庐山，观看大禹疏导九江的遗迹。随后，他到会稽太湟，登会稽山，探查禹穴，上姑苏台，眺望五湖。他到楚国故地，看春申君的故城宫室，到淮阴，了解了韩信的一些情况。北上，他到齐鲁之地，考察孔子遗风，参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。不知因为什么原因，他困在了鄱、薛、彭城，之后经过汉高祖的故乡丰沛，再经梁楚之地回到长安。此次游览，无疑大大丰富了司马迁对历史的认识，不仅使原来的书本知识变得鲜活了，还获得了很多非实地考察就难能知晓的人物事迹和风土人情，为以后《史记》的写作准备了珍贵的素材。

漫游结束后，司马迁开始做官，任郎中。元鼎五年（前112）十月，汉武帝亲临雍州，在这里祭祀天地和五帝。之后继续西行，越过陇山，登上崆峒山，再向西行，直至祖厉河后返回。整个过程，司马迁随驾扈从。元鼎六年，司马



迁“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，中华书局，2013，第3971页），至下一年春，回朝复命。此行，中间有八九个月的时间，可以充分考察西南地区，这对《西南夷列传》的撰述大有裨益。元封元年（前110），汉武帝到泰山进行封禅，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谈扈从，但到达洛阳时，司马谈病重，不能继续随行。此时正逢司马迁出使返回，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后马上赶到洛阳，见了父亲最后一面。司马谈临终之时，拉着儿子的手，老泪纵横，嘱咐他一定要完成一部能够接续《春秋》的史书，司马迁悲伤不已，难过得低下了头，流着泪答应了父亲。泰山封禅是难得的盛事，司马迁赶上了封禅的队伍，随武帝从海上到了泰山，参加封禅。

元封二年（前109），黄河在瓠子决口，武帝率百官塞河，皇帝亲临黄河决口处，沉白马、玉璧于河中祭奠河神，命群臣及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，都背负柴薪，填塞决口。皇帝怕塞河难以成功，还作了《瓠子之歌》，司马迁有感于《瓠子之歌》，写下了《河渠书》。元封三年（前108），司马迁继任太史令，“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”，“百年之间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。”（《自序》）自此，司马迁可以阅读的古籍文献比以前增加了许多，其知识贮备想必是为大为增益。但他并未就此完全沉溺于书山文海之中，而是继续随武帝巡幸全国。太初元年（前104），汉武帝下令改定历法，颁布了《太初历》，司马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“太初改历之议发于公，而始终总其事者亦公也。”（王国维：《观堂集林·太史公行年考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，第254页）《太初历》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；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；以有节无气的月份为闰月，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。《太初历》对后世影响极大，是司马迁著《史记》而外的又一项伟大事业。历法改定后，《史记》正式进入写作阶段。

不幸的是，天汉三年（前98年），司马迁因李陵案被处以宫刑。事件的起因是，天汉二年（前99），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大军征伐匈奴，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作为策应，率五千人出居延，行军三十多天，到了浚稽山，以分散匈奴军的注意力。但当李陵按预定日期返回时，却被八万匈奴军围困，



李陵毫不畏惧，率军与之大战，边战边撤，最后，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，李陵没脸再见天子，投降匈奴。汉武帝知道后，大怒，一些大臣落井下石，只有司马迁出面为李陵说话（见《报任少卿书》），但汉武帝以为他是在诋毁李广利，就把司马迁下狱了。司马迁在狱中待到第二年，当时汉武帝有所醒悟，派公孙敖去匈奴接李陵，但公孙敖无功而返，还听说李陵在为匈奴训练军队（实际是李绪），可想而知，武帝定是火冒三丈，于是灭了李陵全家，司马迁也因此蒙受腐刑。虽说天降大任之人，要忍受艰难困苦，但以一士大夫而受宫刑也未免太残忍了。

太始元年（前96），司马迁出狱，任中书令，含垢忍辱，全力以赴写作《史记》。太始四年（前93），益州刺史任少卿（任安，字少卿）给司马迁写信，希望他能推荐人才，司马迁写信回复，即《报任少卿书》。司马迁的满腔怨愤原先只是藏在心底，汹涌澎湃的情感也被他封存起来，但任少卿的信带来一股强大的冲击力，摧毁了情感的堤岸，由此，才有了这慷慨悲凉、满纸辛酸泪的《报任少卿书》。到太始四年，《史记》还未完成，根据书中内容推断，完成时间大概在征和二年（前91），当时司马迁五十五岁。从此以后，司马迁的行迹难以知晓，很有可能是自杀了。

《史记》完成时，司马迁准备了两部，正本“藏之名山”，副本留在京师长安。到汉宣帝时，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之公布于世。《史记》并不是司马迁自己命名的，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他自称《太史公书》，汉代还有人称之为《太史公记》的。据王国维考证，《史记》之名，开始于魏晋之际。

《史记》有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共一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。本纪记载帝王事迹；表以表格的形式记事件与人物，“如网在纲，一目了然”（钱穆：《中国史学名著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0，第70页）；书是分门别类地叙述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变迁；世家记诸侯；列传记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及事迹。全书各部分互相配合，结构严密，体大思精。

《史记》的写作是很严谨的，司马迁或根据历史典籍，或实地调查访问，多

闻阙疑,忠实记叙了历史过程,这不仅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,还要有史家的学识。例如本纪是记载帝王的,但司马迁却安排了项羽,表面上是自乱其例,不合史实,然而考察秦汉之间的历史,项羽就是实际上的天下之主,为其写作本纪,合情合理。又如孔子,司马迁将其列入世家,称“孔子布衣,传十余世,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,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,可谓至圣矣!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第十七》,中华书局,2013,第2344页)不以名害实,目光如炬,从中可见司马迁非凡的识力。《史记》在接近历史真实的同时,并没有排除主观因素。相反,它是一部发愤之作,其中的个人色彩浓厚。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融入了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,以至于有学者认为:“情感者,才是司马迁的本质。他的书是赞叹,是感慨,是苦闷,是情感的宣泄,总之是抒情的而已!不唯抒自己的情,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。这就是他之伟大处!”(李长之: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4,第92页)所以,虽然是历史著作,却被称作中国的史诗,是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(鲁迅:《鲁迅全集·汉文学史纲要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3,第581页)。

如此一部巨著,其价值是多方面的,简单来说,主要表现在:

发凡起例,正史之首。正史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文献,而《史记》乃正史之首,之后的历代正史都祖述《史记》,虽在具体设置上有所变化,但大体已定,后来者难出其范围。

三千年的历史画卷。《史记》所载上起黄帝,下至汉武帝,三千年左右的历史首次汇聚在一起,贯通古今,网罗百代,其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方方面面,是汉武帝之前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。

文章典范。《史记》不唯在史学上重要,在文学上也是经典,被看作西汉文章的代表和史传文学的高峰,对于后世的散文、小说、戏剧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时代的心灵史。司马迁不仅描摹事件,记叙史实,他还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和体悟历史,观察历史的风云变幻,对历史人物抱有深切的同情,通过文字展现了各色人物的心灵世界,也包括司马迁自己的心灵。后代读者,披阅





其文以人情，便能聆听到司马迁及其笔下人物的心声，感受到时人心灵的激荡。

《史记》公之于世后，受到赞扬的同时，也招来了批评。东汉班固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言：“其是非颇谬于圣人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，此其所蔽也。”王允更称之为“谤书”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虽也有不少正面评价，但从总体来说，“《史记》传者甚微”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。到唐代，《史记》地位提升，出现了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和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，二书和南朝宋裴骃的《史记集解》合称《史记》三家注，形成了史记学的一个高峰。此外，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、柳宗元都对司马迁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奠定了《史记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宋代以来，对《史记》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多样，注疏而外，有了大量评点、考证、专题论述，《史记》所受到的关注非其他史书可比，直至今日，依旧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。《史记》在国外也很受重视，全文或选文被翻译为英、日、德、法、俄、匈牙利等多种语言，广为传播，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。

《史记》是经过历史筛选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著作，值得后人精读细品。从《史记》中我们不仅能学习到丰富的文化知识，还能开阔视野，提升思想境界，使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尽收眼底，培养对中国优秀古典文化的热爱之情。然而《史记》篇幅庞大，头绪纷繁，青少年初读，恐怕难度太大，因此本书从《史记》中选取了一些重要篇章，在原文之前有“题解”，之后有“注释”“品读”“扩展阅读”，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，特别是在“品读”中，尽量做到前后贯通、左右关联。尽管只阅读了一小段内容，读者在“品读”中却能看到事件或人物的全貌。最后要说明的是，文中为了能够引导读者深入思考，会有笔者个人的一孔之见，并非定论，仅作参考。

选本仅是读者进入全书之前的预热，绝不能取代原书。所以，读者如果能够通过本书——不管是因为喜欢还是厌恶——而进一步阅读原著的话，作为编著者，将是十分高兴的。

本书所选《史记》段落出自2013年中华书局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。